

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价值、类型及实践路径

■ 文字乐 田小蓉

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技术基础,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场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也不断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信息承载和传递功能的活动形式或物质载体。立足于数字技术的特点和优势,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价值、类型和实践路径,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价值

1.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局限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信息传播速度慢、覆盖面小等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则为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局限性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在线教育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等新的载体形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能够得到快速的传播。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借助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化传播渠道,使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其中的内容,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覆盖范围。

2.打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困境

由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面临分布不均的困境,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跨时空流动成为现实。一方

面,通过 5G、数字网络平台等技术能够将只在特定场合呈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以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 and 人群中。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交流与合作,教育者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分享各具特色的教育资源和教学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3.推动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之间的融合与协同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括文化载体、活动载体、传媒载体和网络载体等类型,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这些传统载体之间的协同与融合。一是数字技术为不同载体之间的信息流通搭建了桥梁,使得不同载体之间的优势得以互补,共同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二是数字技术能够助力构建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精准地根据不同载体的特点和受众需求,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内容的个性化推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全面、立体,满足不同受众的多样化需求。

二、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类型

1.在线教育平台
在线教育平台是指技术人员通过信息通信等数字技术在互联网平台搭建的一个集教学、互动、资源共享为一体的虚拟学习空间。在这个平台上,教育者可以通过直播授课、上传教学视频、布置作业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受教育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随时随地登录平台进行学习。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使得在线教育平台等载体的功能持续升级和拓展,实现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实时互动,参与者

能够随时提问、发表观点,并得到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另一方面,在线教育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对教育对象的学习行为和进度进行分析,了解教育对象的学习情况、兴趣爱好和思想动态,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同时,在线教育平台也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了跨区域 的流通,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进行传播,并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过程的赋能,实现对思想政治

教育载体的创新。
2.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虚拟现实(VR)技术是指借助数字技术生成一种模拟环境,使用户在其中获得类似现实世界的体验,而增强现实(AR)技术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使用户能够通过一定的移动设备与虚拟信息进行互动。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能够创造出逼真的场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生动的形式叠加到现实场景中,教育对象能够借助一定的工具、手势等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参与感与时效性。同时,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还能够与文化、活动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相结合,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学习和互动体验,有效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力。

3.人工智能辅助教学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进行支持和优化,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如 ChatGPT、豆包等已经具备了解人类自然语言的能力,能够实现与人的实时互动。一方面,人

工智能大模型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教育载体,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极大地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互动水平。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根据教育对象的问题和观点给予精准的回应和引导。这种互动不仅更加及时、高效,还能激发教育对象的思考和探索欲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

三、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实践路径

1.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载体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基础,要实现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必须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通过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确保学校、教育机构等具备高速稳定的网络环境,满足在线教育平台、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应用以及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等对网络带宽和速度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及时更新和升级计算机、服务器、智能移动设备等硬件设施,确保其性能能够支持复杂的数字技术应用。

2.提升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推动教育载体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和教育对象是推动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主要力量,因此,必须提升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一方面,要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技巧、数字资源的开发与整合方法、VR 和 AR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等数字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数字意识和数字教学能力,使其能

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教学过程。另一方面,要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数字技术的意识和能力。教导学生如何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善恶,提高学生在数字环境中的自我保护和信息筛选能力。

3.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制度规范与保障机制,确保载体创新的有序推进

制度体系建设是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保障,因此,必须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制度体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明确数字教育平台的运营规范、数据安全 管理要求、教育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为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提供法律依据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内容监管制度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准则,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明确数字内容的审核标准,对不良信息、虚假信息、有害信息等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过滤,确保数字平台传播的信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要发挥数字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作用,必须正确认识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在联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2024 年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数字技术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XYCSR2024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好“三牛”精神故事,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 刘开华¹ 古桂玉²

“三牛”精神是指“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精神,它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奉献、创新和坚韧不拔的品格。讲好“三牛”精神的故事,对于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具有“三牛”精神的道德楷模和先进人物。思政课老师要积极讲好“三牛”精神故事,自觉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培养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新时代好青年。

一、中华民族站起来进程中,讲好“孺子牛”精神

讲好“三牛”精神故事,首先讲好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为之奋斗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好故事,讲好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梦想付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辈故事。
讲好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进程中涌现出的“孺子牛”精神杰出代表,如: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毛泽东曾写信致谢觉哉,信中说:“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毛泽东给徐特立的信中,称赞徐老:“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外,还有那些牺牲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烈士,如“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这些人物以其卓越的贡献和无私的奉献,成为“孺子牛”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名思政教师,就是讲好“三牛”精神故事,让学生记得来时的路,走得远。

其次,讲好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奋斗历程铸就的中国精神。用

宝贵精神食粮,传承红色基因。如新时代,向广大青年讲好长征故事。讲长征故事,就是告诫青年,长征取得决定性胜利,凭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最终战胜重重困难,取得成功。讲好长征故事,告诫青年,长征胜利启示我们:青年大学生应学会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不轻言放弃。告诫新时代青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广大青年克服生活所经历的挫折、磨难,勇往直前。

二、中华民族富起来进程中,讲好“拓荒牛”精神

“拓荒牛”精神,展现中国人自立自强的志气。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精神中蕴含着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拓荒牛”精神正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它鼓励人们不断探索新路,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因而,讲好中华民族富起来“拓荒牛”精神的故事至关重要。
讲好“拓荒牛”精神,首先讲好我们从无到有的大国重器的研发。“拓荒牛”精神中的“吃苦耐劳、肯实干不空谈”与大国重器的发展息息相关。大国重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实干精神,通过艰苦努力和实际操作来实现技术突破和项目成功。如国产航母、国产大飞机 C919、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载人航天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等众多大国重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富起来道路上形成的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当下,尤其是讲好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

最后,讲好“拓荒牛”精神实质——创

新精神。创新才能强国,创新才能富国,创新才能自强,创新才能争先。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树高千尺,营养在根部”,因而,作为一名思政教师,教授教育对象掌握牢固科学文化知识,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

三、中华民族强起来进程中,讲好“三牛”精神传承故事

新时代,要讲好比站起来的“孺子牛”故事,讲好比富起来的“拓荒牛”故事,讲好“老黄牛”精神,用“三牛”精神开创新局面,继续为新时代造就新的历史辉煌。

新时代,“三牛”精神体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全体优秀中华儿女身上,如为研制大国重器,“两弹一星”科研人员数十年在草原荒漠、密林深山挥洒汗水;为捍卫祖国领土,边疆卫士顶风冒雪、甘洒热血书写无悔青春;为守护生命防线,白衣天使“不计报酬、无论生死”逆行出征……“天惊天地动,做隐姓埋名人”,这些时代壮举和英雄人物都是“三牛”精神的最好素材。通过理论宣讲和实践教学,把老师讲和学生讲相结合,便可以让“三牛”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从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总之,讲好“三牛”故事,关键在于如何将“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精神内涵生动、形象地传达给学生,使之产生共鸣并受到启发。在讲述过程中,思政教师要精心挑选那些能够代表“三牛”精神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故事更具时代性、代表性和感染力。同时,思政教师讲述故事时,要投入真挚的情感,让学生感受故事中人物的情感波动和精神力量。最后,思政教师还要尽量将故事与当前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使故事更具现实意义和启发性。

(作者单位:1.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2.昆明市西山区教科院附属中学)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价值与启示

■ 代 甜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思想

(一)交往行为与语言理解
哈贝马斯将社会行为系统的划分为四种行为类型:1.目的的行为,行为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强调通过合适的手段来达到目的。2.规范调整行为,根据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和标准,组织中的每个成员进行所规定的行动。3.戏拟行为,以交互的主题的形式呈现,行为实施者出于给听众或社会群体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得到认可。4.交往行为,是指两个或多个具备语言行为能力的主体,用语言、文字等方式来互相了解与协作。

(二)交往与主体间性
交往行为理论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建构理性的交流方式,其关键在于建构主体间性结构和自由、平等的主体间关系。哈贝马斯提倡用主体间性,并且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建立在相互了解的交往行为之上,在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中,将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打破主体与他人的差异,让主体间相互理解、包容和交融,达到主体的交融与统一,从而解决意识哲学的困境。

(三)交往行为的理想言语情景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磋商,必须经由一种媒介进行,达到有效的宣告。他指出,实际活动得以实现的语境必须在某种行为准则与价值观之中。人类使用语言媒介进行交流,隐含了一种内在的合理需求,促进交际行为的顺利进行。若失去了这一合理性需求,言语情景就失去了效用,从而造成了交际失败。只有遵循其情景,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成共识,形成道德准则,推动社会的发展。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促进交互主体的相互理解
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是互动的主体间以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为基础的互相了解,对于任何指向人的同一陈述来说,有无数的关联语境的应用方式,共同的文化传统是理解的前提、来源和背景,是一种具有先验性的知识储备存在,在现实的生活中,通过特定的人的语言和行为来构造。同时,由于公共知识背景与文化传统在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中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参与者能够突破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更深层认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实践理性的介入,促进内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之间进行交往性的、交互主体性思维活动,展现交往主体以及主体间的交互自我建构能力,促进交往实践中的相互理解。

(二)促进社会人际交往机制的完善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在社会制度这个宏观层面上,制订出一套适合社会发展情况和方向的规范,同时也要发挥社会规范对社会个人的思

维和行为的制约,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所以,要充分认识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加强人的自我约束,并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充分利用社会机制的内在价值导向功能,营造文明和谐的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使社会交往机制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利于构建理想的商谈语境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要求各主体就自己的看法自由、平等和理性地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理想的协商情境。理想的商谈言语情境应当将所有知识、背景、信息、传统都与所有参与者完全、没有保留地公开,而建立一个交流平台,使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商谈的合理性不在于对平等主体利益的保障,而是要保证内部观点的形成和意愿的形成,以便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究竟何种目标与规范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公民要做的,就不限于以个人自身的利益为取向。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第一,从经济上讲,我国国家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升级阶段,新的价值观还有待确立。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一些人为了追求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导致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交往性理论限制工具理性很必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富裕,但也要看到,社会并非以财富为目的,而是以生活世界为终极精神归宿。

第二,从政治上讲,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党和政府要健全我国民主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为交往主体间进行对称的沟通与了解创造条件 and 保证。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从而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朝着一个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三,从国际上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置身事外。哈贝马斯的交际行为理论强调,在对话中,主体必须平等,相互尊重,避免冲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构建邻国利益共同体方面,走共建共享之路,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发展。

四、小结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主张“主体间性”,破除“主客二元”的传统范式,建立“主体间性”的新范式。“其交往行为理论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理论强调了以语言和符号为核心的交流活动对社会规范建构的影响,把生活世界理性结构的重构定位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重构,实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为实现交往行为的理性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对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滨州依法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析

■ 高 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巩固和发展“中国之治”、推进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推动社会治理和谐向好提供了科学指引。滨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心安城市”,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品质从“平安”向“心安”提升,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滨州、法治滨州。在落地落实层面,矛盾纠纷能否有效化解是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一环,滨州市立足现有社会治理语境,坚持探索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机制,积极落实“心安城市”建设目标要求,社区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强化社区规范性法治审核,注重矛盾源头预防

新时代,大量的矛盾纠纷萌芽在社区、村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经济纠纷,从源头上看是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在村集体收益、邻里关系、身份确认、相关费用的使用等方面的规定模糊不清,甚至出现空白。比如,村集体占地收益的分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小区广告费用的收支使用等,这些规定不当往往会成为信访案件。滨州市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自治章程的修订,突出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模 式,将法治挺在前面,凡是涉及到权益分配、身份确认等与矛盾纠纷相关的规范条款,就要找到上位法,找到相应政策依据,不能想当然,克服惯性思维的影响。一是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框架范围内进行修订,确保不与之相抵触。二是依据各村居社区特点,结合当下矛盾纠纷的热点难点,在文件章程中予以明确规定,避免后期出现争议。三是强化专业指导,组织民政、政法、文明办、司法、农业农村、妇联等部门沟通协调,严格履行职责,制定切实有效管用的约定,避免流于形式。

二、突出化解过程情理法结合,实现定分止争实效

面对新时代社会矛盾多样化、个性化的新趋势,滨州市已全面推开“一站式”调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在基

层乡镇(街道)做到全覆盖,注重多元解纷效能,矛盾化解率保持 98%以上。矛盾纠纷的化解,定分止争、群众信服才是最终目的,不能只追求当时的和解,为日后的信访,甚至是矛盾升级埋下隐患。在基层的矛盾中心,一般配备三支队伍,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为主的劝说情理队伍,以信访、综治为主的政策宣讲、公理阐释队伍,以公检法为主的法治化解队伍。群众有矛盾,通过三支队伍、三股力量的有效合力化解,当事人既做到明白其中政策法规依据,又在法治框架内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还会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到口服心服。同时,“一站式”服务将综治、信访、人社、住建相关职能部门纳入窗口服务,依法制定矛盾纠纷工作规章制度,强化顶层设计,搭建优化组织运行、人员配备等,切实实现“只进一扇门,服务不缺位”。

三、推进线上线下结合,依法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群众对时间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智能手机的普及又为我们线上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滨州市依托“全科大网格”建设,把基层社区原有社会治理、综治、信访、环保等网络统筹协调一张网,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立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搭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平台,立足高效、精准解决群众现实问题,贴心为群众服务的现实需求,搭建政务服务、意见反馈、矛盾调解平台。群众用手机客户端治理平台反馈问题,平台构建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模式,手机操作简便易行,实现群众少跑腿、不跑腿,数据多跑路,把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做到位。制定高效便捷的工作流程,依法有序开展工作,基于线上线下结合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粗放化向精准化转变,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第一时间在后台对接相关主管部门,牵扯到多个部门的,依职按流程流转办理,形成部门合力。这既解决了群众不知道找谁的难题,又方便了主管部门高效对接工作,有效避免“九龙治水”的局面。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校)

试论当代年轻人熬夜现象

■ 李文凯

2023 年《年轻人熬夜报告》显示,几乎每天都熬夜和经常熬夜的年轻人占比超过 70%。几乎不熬夜和从来没有熬过夜的年轻人占比仅有 3.9%和 0.06%。据中国睡眠研究会《2024 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平均睡眠时长为 6.75 小时,平均入睡时间为 00:01,47%的人群在零点后入睡。其中,“00 后”平均入睡时间为 00:33,相较而言“70 前”入睡时间为 23:02。56%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超过 8 小时,且有 52%的人在零点后入睡,更有 19%的人入睡超过 2:00。

根据知网搜索“熬夜”二字的结果显示,共 1481 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医学研究,排行第二的是教育学研究:32.37%为预防医学及卫生学论文,12.20%为医学论文,7.43%属于中等教育论文。也就是说,国内有关“熬夜”的研究主要是医学和教育学,主要关注熬夜对身体和学习的危害。但如果国内关于“熬夜”的研究仅限于此,将“熬夜”归咎于个人因素,则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也就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年轻人熬夜并不是个人偏好那么简单,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只有挖掘其内在的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理解年轻人的行为,进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的观念和秩序被认为是落后的,是社会现代化的阻碍,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社会土壤,加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经济话语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传统在走下坡路。根据滕尼斯的概念,共同体和社会形成了对立。以原生血缘、亲族为纽带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有机体”,走向通过契约、制度、权力组合而成的机械联合体,是基于利益动机、依靠“理性”权衡而生成的“社会”。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式微,血缘纽带不再是个体的唯一联系,加之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社会的结构

变迁进而影响了个人惯习的形成,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从“总体性社会”走向“个体性社会”。在这个背景下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个体越来越孤独,原来的社会纽带和观念难以适应这个社会,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在“市场经济”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过去的记忆和现实极不相符,造成落差感。

当代的年轻人是“个体性社会”的主力军。虽然社会呈现个体化倾向,但集体的力量仍比较强大,对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年轻人拥有个体化的惯习,但个体化的惯习和社会场域不能完全匹配,这就造成了所谓的“理想很现实,现实很骨感”的偏差。这也造成了“行动异化”,即年轻人并不能调和观念和 社会现实的矛盾,这也是个体自由和社会束缚间的矛盾,在熬夜过程中年轻人能体会到一定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内心需求得以满足,进而得以在社会立足,“白天上学上课,晚上熬夜”类似于中国哲学的阴阳平衡,调和了二元对立,在这样的行动中,个人和社会达到平衡态势。

《2024 年当代青年洞察报告》显示,23.00%的青年人熬夜属于“享受型熬夜”,影响因素有“享受独处氛围”“享受夜生活”“单纯喜欢熬夜”。“熬夜”作为如格尔茨所言的“弱者的武器”,成为年轻人逃避“骨感现实”的手段。知乎网友“咸味熊”说,“我为什么喜欢熬夜?因为从 0:00-5:00 之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休息,这段时间就像我一个人的私有,或者像从另一个世界偷来了几个小时,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随意放松自己的情绪……”熬夜能让年轻人得到情绪价值,是现实的避风港,调节现实带来的消极心理,不仅仅是一种“不良习惯”。

制度性时间和个体性时间的矛盾促成了“时间异化”,也就是说,年轻人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时间倾向于

指向他者(学校、工作),受到他者的支配,体验为时间的失控感和剥削感,时间被异化。在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里,制度性时间和个人时间是同一的。年轻人的个人时间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制度时间,时间不属于自己,也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因而年轻人选择牺牲睡觉时间去熬夜是为了弥补一种失去,在制度性时间和个体性时间之间寻求平衡。

空间的异化也是促使年轻人选择熬夜的动力机制之一。现代背景下的人与物理空间的联系愈来愈松弛,这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年轻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超越空间的互动,加之互联网软件会根据算法计算使用者的偏好,使用者总能在互联网上得到情绪价值,形成个体性质的虚拟空间。熬夜便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虚拟空间,这样一个空间不断塑造和满足自身的偏好。相反,其他空间不一定拥有这样的能力,比如说学校、公司并不会根据个人的偏好意愿定制学习或工作内 容。《2024 年当代青年洞察报告》显示,短视频平台是当代青年熬夜消遣的首选方式,其次是社交平台和打游戏,占比分别为 28.49%、14.86%、11.00%;另外 2.33%的青年“和朋友聚会”,4.24%的青年“学习看书”,线下活动占比很小。

滕尼斯说:“在我们的经验让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社会大厦里,对其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似乎个人的需求或爱好与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一直存在着某种几乎无法沟通的鸿沟。”也就是说,社会和个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对立,年轻人“熬夜”现象是二元对立的体现。熬夜的动力机制有行动的异化、时间的异化和空间的异化。我们只有从社会和个人 的角度去探讨熬夜,才能得知熬夜的内在源泉,更好的“知”有利于更好的“行”,才能提出更好的促使社会进步的方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